

北京大学历史与社会研究丛书

北京大学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历史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 联合主办

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城市： 生活空间、权力结构与文化衍生

Modern
Chinese Cities:
Living Space,
Authority Structure
and Cultural
Derivatization

主
编
王
元
周
徐
鹏

江苏人民出版社

『北京大学历史与社会研究丛书』

北京大学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历史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 联合主办

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主编 王元周 徐鹏

城市： 生活空间、权力结构与文化衍生

Modern
Chinese Cities:
Living Space,
Authority Structure
and Cultural
Derivatization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生活空间、权力结构与文化衍生/王元周总
主编;徐鹏主编.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 10
(北京大学历史与社会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214 - 21330 - 3

I. ①城… II. ①王… ②徐… III. ①城市史—研究
—中国—近现代 IV. ①K928.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47938 号

书 名 城市:生活空间、权力结构与文化衍生

主 编	王元周 徐 鹏
责 任 编 辑	于 辉
装 帧 设 计	姜 嵩
出 版 发 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9.75 插页 1
字 数	251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 - 7 - 214 - 21330 - 3
定 价	4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近年来,随着国内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国内社会史研究内在路径的演进以及海外城市史研究范式的引入,中国城市史逐渐成为社会史领域新的学术增长点。城市的发展既应该自在,也应该自为。城市作为一个人口聚集,工商业汇聚的人口聚落而存在,即城市一定要有其城市景观,有其作为市(或城市)的实体地域与行政地域。近代中国城市,延续了其作为各级政治中心所拥有的政治资源,而其政治生态,则更加纷繁复杂,城市亦成为各种政治与社会力量交锋的主战场。与此同时,城市也衍生出具有鲜明特点的城市文化。

对于城市史的研究主体,通常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的城市史主要关注城市营建史、市政发展史,而广义上的城市史,则可以理解为城市中发生的历史,包括城市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故而,城市既是一种聚落、一种景观,又是一种场域、一种文化,更是一种方法。有鉴于此,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大学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历史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决定联合举办北京大学第二届“历史与社会”研究生工作坊,并将主题定为“城市:生活空间、权力结构与文化衍生”,旨在为国内外从事中国近现

代城市史研究的青年学子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以期互相砥砺。

此次研究生工作坊自 2016 年年初确定主题并发布征稿通知以后，先后收到参会论文 70 余篇。经过三轮审稿，共选出其中 26 篇优秀论文，并邀请其作者来京参会。26 位代表分别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澳门大学等十余所高校与科研机构。

工作坊于 2016 年 10 月 29 日至 31 日在北京大学李兆基人文学苑召开，开幕式上，首先由工作坊的发起人之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元周教授致辞。王元周教授指出，随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深入，作为社会史与专门史的重要领域，城市史愈发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而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化过程中诸多问题的凸显，更有必要从历史学的角度对近代中国城市进行研究。此次会议邀请到了一批从事中国近现代城市史研究的青年学子，王元周教授也希望各位参会代表能够多交流，共同推动近现代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参加工作坊的嘉宾还有北京大学臧运祜教授、刘一皋教授、欧阳哲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韩策博士、赵诺博士。此外，工作坊举办期间，著名城市史学者、澳门大学历史系王笛教授应邀为参会代表作了题目为《西方关于新中国城市史的研究现状及问题》的讲座。会议结束后，经过整理，我们共收录了 14 篇优秀论文，围绕城市景观与空间、城市权力结构、城市文化三个专题向读者呈现。

专题一为“城市景观与空间”，共收录 5 篇论文。城市景观方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洪瑛媛的《试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传统”建筑物——〈旧都文物整理计划〉之前奏》一文，重点探讨随着日本侵略步伐的加快，民族主义激昂，南京国民政府便迎合这种民族主义情怀而推动《旧都文物整理计划》，将北平的古建筑塑造成“传统”建筑物，与此同时，创造了北平的“传统”文化中心形象，使得“传统”景观走向“民族化”。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张宸所撰《民国时期成都银行的建筑

形态与日常空间》一文,以民国时期成都的银行为研究对象,一方面从地理区位、大楼、宿舍及仓库等方面考察成都市银行的建筑形态;另一方面从银行职员状态、业务经营及通货膨胀下的存款危机为例,从空间与社会的层面考察成都市银行的日常生态。近代中国城市,政治对城市的发展依然有重要的影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陈杰的《从新集寨到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根据地的城市建设》一文,以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为研究对象,探讨革命时期的城市与社会建构。作者认为,首府地位的形成与新集城内社会形成密切互动,市内各级政权机构先后设立,城市人口迅猛增加,社会治安体系日趋严密健全,民间群团组织活跃,舆论导向明确,宣传动员效果明显。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李小东的《天桥、东安市场、庙会——近代北京平民的公共空间的形成与运作》一文,以近代北京平民的公共空间,如天桥、东安市场和庙会等三个平民进行消费娱乐活动的主要场域为研究对象,认为这些公共空间在实际运作中表现出了极大的包容性,使得政治与社会、精英与平民、国人与洋人都能够各取所需而非尖锐对立。但是,公共空间内的娱乐和消费活动并没有催生出一个完全独立于政治、实现完全自治的社会。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刘静姝的《清代中后期北京戏曲娱乐中的公共与私密空间——以舞台和私寓的变化为中心》一文,认为在清代中后期北京娱乐空间的变化中,公共舞台经历了一次从退隐到回归的过程。通过对舞台的退隐与回归过程的揭示,有利于探讨清代中后期笼罩着北京各阶层的时代风气和社会矛盾的变化。

专题二为“城市权力结构”,共收录5篇论文。信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张乐锋的《工业建设与建国初期闵行镇的归属纷争》一文,以闵行镇因工业建设与市政建设之间的矛盾而产生的归属问题作为切入点,探讨了一定时期内,国家政策、经济体制、地方与部门利益、城乡关系等与基层政区调整间的多重关系,进而探讨上海市由城市型政区向地域型政区的转变过程。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赵斐的《处置

权、租佃权与使用权——成都青羊宫劝业会中的地租研究(1906—1949)》一文,对清末、民国初年、民国二十年代、国民政府时期几个时期官方、庙方与商家在青羊宫、二仙庵的空间权力之争作梳理与探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努丽亚·卡迪尔的《共和国初期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研究(1949—1956)》一文,通过考察 1949—1956 年间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的组织与宣传情况,作者发现,以 1953 年为界,中苏友好协会在组织隶属上逐渐失去了其作为群众组织的独立性,中共对其控制逐渐加强;在宣传内容上,随着苏联对中国大规模的经济援助以及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学习苏联建设经验逐渐成为中苏友好协会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赵鹏的《群众运动中专业化倾向——1950 年代治淮工程的技术问题研究》一文,以群众化运动中专业化倾向为切入点,探讨 1950 年代治淮过程中的技术问题。作者认为,随着 1956 年淮委解散,国家主导的治淮工程告一段落,治淮工程进入各地自行主持的地方治淮时期,技术专家对于技术问题的控制和把握消失。同专业化的倾向相比,群众运动自主性的一面更多地展现出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武嘉玥《建国初期(1949—1958)石景山发电厂运动问题略论》一文,从 1949—1958 年这一时段入手,以“增产节约运动”、“一长制”、“精简人员”运动、“先进生产者运动”、“整风运动”为研究线索,分析和论述石景山发电厂在历次“政治”或“技术”运动中不断进行革新和调整的种种努力,以石景山发电厂为例展现出建国初期工业从百废待兴至逐渐发展的过程。

专题三为“城市文化”,共收录 4 篇论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徐鹏的《民国前期市政改革思潮研究(1912—1928)》一文,以 1912—1928 年间市政改革思潮为切入点,从更长的视角梳理这一时期国内市政思潮兴起的原因以及思潮对市政的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博士研究生刘明的《上海求志书院及其考课制度述论》一文,认为上海求志书院倡导时务与西学,士子应课不限身份,且优加奖励,成功吸

引大量士子投身其中,成为晚清上海地区促进学风之转变、培养新型士子的重要学术中心。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蔡佳宏的《再议“世界主义”》一文,以陈独秀、朱执信、杜亚泉等人为例,对五四时期的“世界主义”思想情形作一梳理,重点观察“世界主义”思潮在欧战期间及战后的发展情况,并试就“世界主义”源起及发展、“世界主义”与欧战之关系、时人所具“世界主义”倾向之原因等三个问题展开分析与讨论,以期还原“世界主义”思想发展之复杂脉络及多重面相。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赵茜的《电影、都市生活与女子体育——中西碰撞中的〈体育皇后〉》一文,以电影《体育皇后》为切入点,探讨新生活运动时期的电影、都市生活与女子体育,认为该电影与国民政府塑造新国民的政策遥相呼应,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众的体育观念。

综上,此次工作坊所探讨的主题,既有狭义上的城市史,也有广义上的城市史,内容涉及近代中国城市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既有对市制、市政、政区等基本问题的探讨,也有对市民生活、公共空间、城市景观等新领域的研究,一定意义上展示了目前国内从事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青年学子的基本学术素养。当然,本次工作坊参会论文也存在一些不足,如个案研究过多而宏观论述较少,对市政、市制等传统问题仍需要加强理论构建。从研究对象的范围来看,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成都、宁波、徐州等几个城市,对于其他地区城市,如东北、西北,以及边疆一带的城市较少涉足,且对县下市镇、中小城市的关注度也不够。这些不足与缺憾,也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本书所发表的文章,经由作者会后修订,代表了作者本人的学术见解。从会议的召开到本书的出版,得到北京大学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历史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谨表谢忱!

目 录

前言 1

城市景观与空间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传统”建筑物

——《旧都文物整理计划》之前奏 3

民国时期成都银行的建筑形态与日常空间 17

从新集寨到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根据地的城市建设 46

天桥、东安市场、庙会

——近代北京平民的公共空间的形成与运作 61

清代中后期北京戏曲娱乐中的公共与私密空间

——以舞台和私寓的变化为中心 84

城市权力结构

工业建设与建国初期闵行镇的归属纷争 109

处置权、租佃权与使用权

——成都青羊宫劝业会中的地租研究(1906—1949) 128

共和国初期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研究(1949—1956) 148

群众运动中专业化倾向

——1950年代治淮工程的技术问题研究 173

建国初期(1949—1958)石景山发电厂运动问题略论 188

城市文化

民国前期市政改革思潮研究(1912—1928) 215

上海求志书院及其考课制度述论 239

再议“世界主义” 259

电影、都市生活与女子体育

——中西碰撞中的《体育皇后》 287

城市景观与空间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传统”建筑物

——《旧都文物整理计划》之前奏

洪瑛媛^①(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摘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蒋介石提倡民族主义,以保全领土并稳定国内局势。国都建设之际,为构建统一的“民族”认同感,南京国民政府在南京、上海等城市积极推动建设“中国固有之形式”建筑。但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且不符合新生活运动的价值观——简单朴素,故政府想以古建筑替其发挥政治作用,即增强国家认同感。随着日本侵略步伐的加快,各界精英提倡民族主义,南京国民政府便迎合这种民族主义情怀而推动《旧都文物整理计划》,在将北平的古建筑塑造成“传统”建筑物的同时,创造了北平的“传统”文化中心形象。

关键词:民族主义 传统 “中国固有之形式” 古建筑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官方与民间人士提出了不少的北平城市规划,其主要内容为将北平建设为教育、游览中心,前提则是整理名胜古迹,但由于政治、财政方面的种种原因和计划案本身的问题,一直没有落实。直到1934年12月,行政院会议议决通过北平市政府拟具的《旧都

^① [作者简介][韩]洪瑛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12年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北京市市史。

文物整理计划》，并于第二年正式开工修缮北平的许多古建筑，对北平进行重新定位，将这座城市形象塑造成为“传统”文化中心。此时，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并没有明显好转，中央政府往往欠拨补助款，地方政府的窘困同样未能解决，而北平文物整理工程所需资金高达 309 万元，^①鉴于 1929 年至 1934 年度北平市平均岁出为 499 万元，^②这笔文物整理经费可谓相当庞大。那么，中央政府为何至 1934 年又全力支持《旧都文物整理计划》了呢？南京国民政府为何塑造北平的“传统”文化中心形象，这乃是本文的问题意识之所在。

本文对“传统”文化的观点基于霍布斯鲍姆和兰格的《传统的发明》一书，霍布斯鲍姆主张：“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③该书将“传统”与民族主义紧密联系起来，梳理“传统”的形成与传播，进而指出了被近代民族国家“发明”的“传统”之政治作用。本文通过南京国民政府将对“中国固有之形式”建筑的关注转移到北平古建筑上的过程，进一步考察“传统”背后隐藏着的政治意图。

建筑学界以往有关这一时期建筑形式演变的研究成果，从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不同角度论述了“中国固有之形式”的发展过程，但均把重点放在传统和现代、中式和西式建筑的二元对立上，似乎没有注意到“中国固有之形式”不是传统本身，而是一种“发明传统”的过程。^④

①《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组织规程》，《国民政府档案》，1934—1937 年，档案号：001012100A025，台湾“国史馆”藏，文物整理所需经费为 309 万元，由铁道部筹措 109 万元，由财政部与北平市政府各负担 100 万元。

②朱炳南、严仁赓：《北平市之财政》，《社会科学杂志》1934 年第 5 卷第 4 期，第 541—542 页；北平市政府秘书处第一科统计股编：《北平市统计览要》，北平市政府秘书处第一科统计股，1936 年，第 50 页。

③[英]霍布斯鲍姆、兰格编：《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年，第 1 页。

④主要的成果有赖德霖：《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年；邓庆坦：《中国近、现代建筑历史整合研究论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年等。

而历史学界已有研究,虽早已指出《旧都文物整理计划》是“发明传统”的一个例子,但很少关注《旧都文物整理计划》与“中国固有之形式”有何关系。^① 本文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档案、报刊和政府出版物,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

一、“中国固有之形式”的“发明”

英国历史学家盖儿纳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定义:民族主义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② 1912年,近代民族国家中华民国成立后,面对外国列强的威胁,为保全领土,政治决策者们从五族共和的民族主义路线走出来,走向更高的目标,即中华民国单位和中华民族单位的一致。^③ 显然,中华民族则是安德森所说的“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这一共同体被认为应该拥有统一的民族认同。基于此种认识,南京国民政府决定采取“发明传统”的策略,对历史进行重新诠释,积极推广民族国家体系。^④ 正如在19世纪英国重建议会大厦时,“有意识地”采用哥特形式,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首都计划》,并规定公署及公共建筑物尽量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⑤

所谓的“中国固有之形式”,“大抵以中国式为主,而以外国式副之,中国式多用于外部,外国式多用于内部”。外部采用中国式的主要目的,

① 主要的成果有董明:《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② [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页。

③ 参见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冯谊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八、九章;[美]路康乐:《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王琴、刘润堂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五章;[韩]裴京汉:《辛亥革命직후 몽골독립에 대한孙文과革命派의 대응(辛亥革命后,孙文与革命派对蒙古独立的对应)》,《人文科学》2000年第30辑。

④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页、译者导读第15页。

⑤ (民国)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编:《首都计划》,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第60页。

是以谋求崇阔壮丽的效果，易于引人注目，故“中国固有之形式”的最大特点，则是施用宫殿式造型的大屋顶。^① 据霍布斯鲍姆的分析，“发明传统”的背后，通常隐藏着“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的目的。^② 那么南京国民政府为何采取参照旧宫殿式来“发明”“中国固有之形式”呢？

南京国民政府声称：“文化之为物，大都隐具于思想艺术之中。原无迹象可见，惟为思想艺术所寄之具体物，亦未始无从表出之。而最足以表示之者，又无如建筑物之显著，故凡具有悠久历史之国家，其中固有之建筑方术，固当保存勿替，更当发扬而光大之……国都为全国文化荟萃之区，不能不藉此表现，一方以观外人之耳目，一方以策国民之兴奋也。”^③不难看出，“中国固有之形式”从此“被发明”为中华民族共同感到骄傲的伟大“传统”建筑形式，南京国民政府将以此向世界展现中华民族的自信力。

国民政府倡导的“中国固有之形式”，在建筑界掀起了民族主义思潮，决定了新建筑的价值取向。1930年，在上海发起“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前锋》月刊，积极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发表了《中国的建筑与民族主义》一文。^④ 该文以各国建筑为例，归纳出：“民族的精神伟大，其建筑物亦伟大；民族弱小，其建筑物亦简陋”的结论，从而主张“以民族主义及民族精神为中心，为中国的建筑物来开辟一条出路”。^⑤ 在《中国美术建筑之过去及其未来》一文中，建筑师刘既漂亦认为：中国建筑的惟一出

①（民国）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编：《首都计划》，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第62—63页。

② [英]霍布斯鲍姆、兰格编：《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2页。

③（民国）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编：《首都计划》，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第60页。

④《前锋》的编辑朱应鹏，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监察委员会委员，同时也是《申报》的编辑。因此，《申报》副刊常专文介绍该刊的主要内容，该刊从而具有了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周蕊秀、涂明：《中国近现代文化期刊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17—318页；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8年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1—67页。

⑤ 杨民威：《中国的建筑与民族主义》，《前锋》1930年第1卷第1期，第63页。

路便是新作风,为修成新作风,应该注意“新文化表现之发源点”——南京,借着建设南京的机会,“寻求一条新路出来”。^① 对于所谓的新作风,曾任中国建筑师学会会长的范文照,指出:“研究新派的建筑师,他们推倒西方不良的艺术及参杂东西不齐的建筑,……他们利用科学化来布置房屋,又能保存中国数千年的古代美术。”^②简言之,新作风是指“中国固有之形式”,也就是以“大中华主义”为核心的“新传统”。

其实,官方建筑形式的复古趋向,从1925年中山陵的设计就显现出来了。^③ 嗣后,随着中央政府的积极推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在南京、上海和广州等南方城市出现了一批带有北方式大屋顶的建筑物。然而,创新并维持“新传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1925年5月,孙中山葬事筹备委员会公布《陵墓悬奖征求图案条例》,规定建筑预算为30万元,^④但到1931年6月为止,仅建设费一项就超过94万元,再加上工程费和购地费分别为约221万元、23万元,中山陵工程完全落成前,总造价已高达338万元。^⑤ 孙中山奉安大典时,陵墓第三部工程就是因国库支绌而未能完竣,^⑥据负责第三部工程的总理陵管会报告,其经常费、临时费一直入不敷出,“以致经济时感困难”,至于工程款项,“需款孔殷,而款项来源几濒绝境”。^⑦

“中国固有之形式”的宏壮伟丽,导致该形式建筑的总造价高居不下,财政窘困的南京国民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削减建筑事业开

① 刘既漂:《中国美术建筑之过去及其未来》,《东方杂志》1930年第27卷第2期,第139页。

② 范文照:《中国的建筑》,《文化建设》1934年第1卷第1期,第138页。

③ 赖德霖:《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6—198页。

④ 《陵墓悬奖征求图案条例》,载于南京市档案馆、中山陵园管理处编:《中山陵档案史料选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51页。

⑤ 《总理陵管会关于一九三〇年前经费概况之说明》,南京市档案馆、中山陵园管理处编:《中山陵档案史料选编》,第465页。

⑥ 《总理陵管会关于陵墓第三部工程概述》,南京市档案馆、中山陵园管理处编:《中山陵档案史料选编》,第175页。

⑦ 《总理陵管会关于一九三〇年前经费概况之说明》,南京市档案馆、中山陵园管理处编:《中山陵档案史料选编》,第463—465页。